

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2

神亮三郎編著

梵藏漢和
四譯對校
翻譯名義大集
(上)

華宇出版社

白聖大師序

近三十餘年來，台灣佛教之發展，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。其中，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為衆所週知之事實。

台灣光復之初，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，即或單行本佛書，亦為數甚少。然時至今日，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，藏經之流通於世者，乃有六、七部之多。與三十年前相較，真有天淵之別。

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，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：

其一，為大正藏、卍續藏之再版。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，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，此事居功甚偉。所惜者，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，吾人不過翻版而已。

第二件大事，則為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（一百冊）之出版。該書為國人自編，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。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，頗便初學。

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為新編新版，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，故較乏新義，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，自有所不足。此次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

、開譯場，由藍吉富居士主編，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，悉逐譯爲中文，編成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，亦更爲艱難。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，實非過甚之辭。

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，朱居士索序於余，因贅數語，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。

白雲

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

印順大師序

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共一百冊，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，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，雖以日文作品為主，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。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，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！

我們中國佛教，過去經長期的翻譯、研求與闡揚，到隋唐而大成。這是以中期的「大乘佛法」為主，上通初期的「佛法」，下及後期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中國固有的佛教，基礎異常深厚，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，適應現代，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。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，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，各宗奧義，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，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，研究、抉擇而予以貫攝，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，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。遺憾的是：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，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；傳統的佛教界，又不能重視佛學。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、研究水準，遠遠的落後於國外，無法適應趕上，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！

我覺得，三十年來，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，宗教自由，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，對於佛教學的研究

發展，已有了可能性。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在這時編譯發行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！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，增進研究的方法，特別是梵、巴、藏文——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，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，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。這部書的出版，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。

印 順 七十二年十一月於台中

星雲大師序

十九世紀以來，歐美列強，由於政治、經濟、宗教等因素，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。西洋的佛學研究，即造端於此。其後，在漢學、東洋學、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，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。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，終至有「佛教學」一門學科產生。

日本在十九世紀末、南條文雄、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，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。近百年來，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，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，佛書之刊行量，亦為舉世所矚目。

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，大多站在學術、文化立場，是人本主義的。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、巴、藏、漢等各種語文資料，以及史學、社會科學、考古學等方法。因此，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，然而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，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，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。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，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，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，自是可以預卜。

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一大叢書，內含歐、美、日本佛學名著一百種，並悉譯為

中文。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，值得隨喜。
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，乃略述數語如此。

星云

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

淨心大師序

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，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，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。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，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，去探索佛教的內涵、發展及其影響。

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，從印度部派佛教、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、大乘之中觀、瑜伽、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，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，都屬於這一類。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，則起源於近代西方。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、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「佛教學」。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，從十九世紀以來，迄今爲止，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，而爲歐、美，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。

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，對於傳統研究，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，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。可惜，到近世以來，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教研究頗爲陌生，而且在傳統學方面，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，比起曾受我國佛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，也頗有遜色。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。因此，如何振衰起蔽，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

思索的問題。

這次，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居士籌印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爲中文。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，恰好爲「如何復興中國佛學」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。相信這部書的完成，將會爲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，奠定堅實的基礎。其學術意義與價值，是值得讚揚的。

淨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

演培大師序

自釋尊涅槃之後，中印各國的佛教，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。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，有一種共通的特質，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，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。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，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，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。

近代日本、西洋的佛教研究，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。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。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，但是對史實的重視，則較古人為甚。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，而不致混淆。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，都較前人寬廣，乃使「佛教研究」蔚成一大學術王國。舉凡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史學、哲學、醫學、天文、歷法……等層面，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。

因此，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，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。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，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，對我國佛學的推展，必有相當程度的貢獻。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」，所選譯的一百部書，幾可謂為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。全書

出齊後，對我國佛學界的裨益，是可以預卜的。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，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。

適 叻 七十二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

編者序

近百年來，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。其一爲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。印度、中國之外，錫蘭、西藏、中亞（西域）、日本、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，逐漸大白於世。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，是如此波瀾壯闊；佛教的修持與義理，是如此龐大恢宏。

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。梵語、巴利語、藏語、華語的並行；考古學、歷史學、社會學、哲學、比較宗教學……等輔助學科的應用，使「佛教是什麼？」「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」等問題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。

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，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，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，大異從前。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，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。然而，很可惜的是，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。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，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，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。

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，是我國佛學

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我們才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，引介給國人。當然，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，但是，去認識它們的方法、態度、與成果，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。這種認識，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。

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，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。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，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。但是，我們堅信：「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！」因此，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，而毅然起步。

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、張光雄二先生，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，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。這種為佛法、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，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。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，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。

蔡光富

七三年十一月「譯叢」第一輯出版前夕

翻譯名義大集

下冊 本文

No. 3929 — 9565

(269 頁— 616 頁)

梵藏和漢四譯對校「翻譯名義大集」序

柳亮三郎

「翻譯名義大集」原是梵藏對照的佛教大辭彙。藏語稱爲 Lo-paṅ mañ-pos mdsad-paḥi bye-brag-tu rtogs-par byed-pa chen-po，或略稱爲 Bye-brag-tu rtogs che 書名原意是指由多位學者及譯官共同編纂的大辭彙。在西藏翻譯佛典最隆盛的時代，從印度入藏的碩學高僧，採錄佛教經典中的常用語句，類別成二百八十餘章，再經西藏譯官把它譯成藏語，並整理成梵藏對照的辭彙，作為有意翻譯佛典的人的永久準據，這就是本書。

此書的編纂時代，古來相傳是在西元第九世紀。由本書第六十五章中列出的九十餘種經典名稱來看：或爲華嚴部經典、或爲般若部經典、或爲說一切有部律，其種類至爲雜駁，都是西元九世紀以後所譯出的。且由列名譯場的印度學者來看：如蓮華戒（Ka-mala-cīla）、勝友（Jina-mitra）、戒主覺（Ch-lendra-bodhi）、無邊吉祥（Ananta-cīla）、蓮華藏（Kamala-gupta）、業鎧（Karma-varman）、智

成就 (Jñāna-siddhi)、智藏 (Jñāna-garbha)、布施戒 (Dāna-cīla)，則都是西元第九世紀或更早以前遠蹈雪山之雲從印度入藏的人。

八世紀末葉，是吐蕃對唐作戰得勝的時代，到第九世紀，與唐和親，承續戰勝的餘烈，吐蕃國運正有沖天之勢。尤其是赤松德贊王 (Khri-sron-ldebs tan ral-pa chan) 時代的翻經事業，在王者的保護之下，極為隆盛。二百餘年前，藏語既無文字亦無典籍，僅有結繩記日的樵牧之語。但這時竟發展成能翻譯般若、華嚴、唯識等玄遠的思想概念。以最缺乏語典上的變化、連綴字法也尚未固定的語言，翻譯最富有語典上的變化的語言，其混雜的情形，真難以想像。因此固定綴字法和固定譯語，是當時的急務。所以，印度出身的學者與西藏出身的譯官，依照當時一般的趨勢，編纂梵藏對照的辭彙，是毫不足怪的。

宋元之交，西藏佛教漸漸傳播到中國與蒙古。到了元代，有不少喇嘛學僧在中國翻譯西藏語經典為漢語，喇嘛教在中國與蒙古的根柢漸漸牢不可拔，所以「翻譯名義大集」開始在中國與蒙古的佛教徒間流傳。不知在以後的那個時代，出現了中文與蒙古文的翻譯。於是本來只有梵藏兩體的「翻譯名義大集」加上了漢蒙兩譯，乃成為四譯對照的佛教大辭彙。